

『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书系

LIANGZHE

WENXUE

YU

WEN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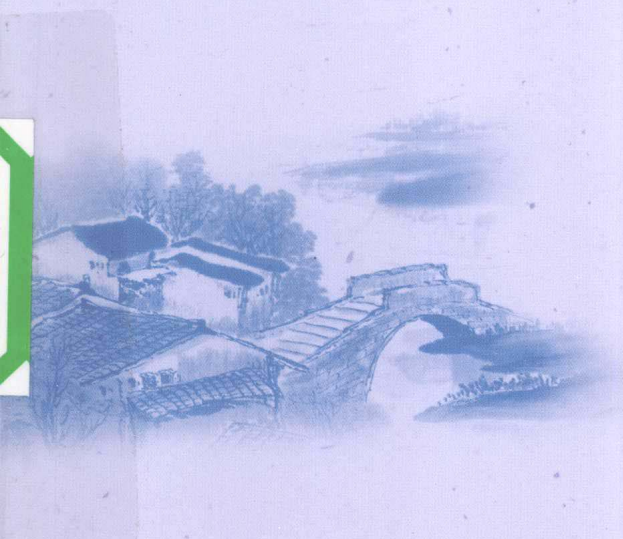
YANJIU

SHUXI

两浙人文传统与 百年浙江文学

潘正文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LIANGZHE

『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书系

WENXUE

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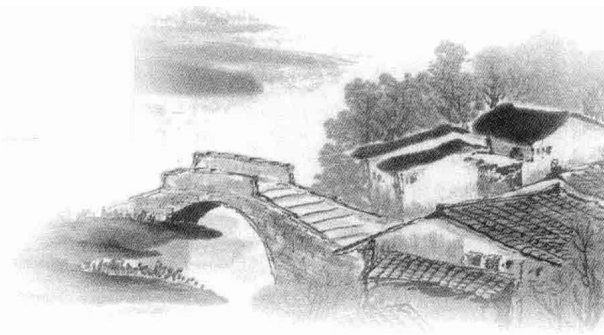
WENHUA

YANJIU

SHUXI

两浙人文传统与 百年浙江文学

潘正文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浙人文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潘正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

(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5004-8509-4

I. ①两… II. ①潘… III. ①文学史-浙江省-20 世纪

IV. ①I209. 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209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 现代化进程

地域文学研究，作为侧重从地域文化视野中透视特定地域文学的独特质地、品格和独创性成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诚如严家炎先生所言：“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 20 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① 在地域文学视阈内，由两浙文化传统孕育的“两浙文学”，应是中国各地域文学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之一。它地域形态完备，历史积淀深厚，尤其在近现代获得快速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由是，探讨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此总结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审视“两浙”和“两浙文学”的概念形成，从地理学、行政区划、区域社会学等诸多层面考量，它经由历史的沿革而生成，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所谓“两浙”，通常是指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隔成两块：江之东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称“两浙”。历史形成的“两浙”概念，

^① 严家炎：《20 世纪中国文学和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1998 年版丛书卷首。

起源颇早，唐代就置“两浙道”，宋时改称“两浙路”，可见“浙江”之称谓早就置于典籍，说明它在中国的省域建制中是渊源颇久的。不过，那时的两浙地域，范围较广，相当于今日的“小江南”之说。唐时的“两浙道”，浙江东道领有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浙江西道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茅上以东、浙江新安江以北地区，^① 它虽然囊括了浙江全境，但毕竟有较大的区域延伸。基于如此区域划定，历史上的“两浙文化”和“两浙文学”，应是包括今浙江、上海、苏南、皖南等地的区域文化和文学，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江南”文化和文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的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复杂构成，对后世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其文化/文学的多样形态（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浙东文学和浙西文学），历来是我国传统文化/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研究“两浙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便是研究“江南文学”，产生在以浙江为主要地域的“两浙文学”也便有了视野更开阔、内涵更深广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当然，历史上所说的“两浙”地域和“两浙文学”，也并非全是“小江南”意义上的，也应有浙江自身的特指性。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浙江独立建省，“两浙”之称单指浙江一地的意义逐渐趋于明晰，“两浙文学”也就有了浙江自身的独特内涵。浙江以省建制，始于元明之际，那时的“两浙”称谓，也就不再有涵盖“小江南”的意义。清代乾隆年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卷1载：

元至正二十一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

^①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①

至是，“两浙”遂有了确切的地域界定，而且从划定的区域看，元明清时期“以省称”的“两浙”已完全同于今天所说的浙江。由是观之，以“两浙文化”和“两浙文学”单指浙江的文化/文学传统，有着史乘的依据，特别是在中国晚近的历史过程中，其蕴涵的“浙江”指向就越来越明确。因此，当我们今天研究浙江的文化和文学，探究其历史继承性和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时，就不能不谈“两浙”文化/文学传统，用“两浙文学”称说浙江文学的前后传承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也是有相当合理性的。而且从文学的传承关系看，“近传统”对当今文学的影响显然要大于“远传统”，20世纪十分辉煌的浙江新文学便主要是在承续晚近的“两浙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发展的，如此说来，具有单独指向的“两浙文学”的研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我们这里研究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所说的“两浙文学”，就包括两层含义：“小江南”意义上的“两浙文学”和单指浙江的“两浙文学”，而又以后者为重。因为探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深层的文化积淀固然需要用力开掘，但对于“现代”更具观照意义的“近传统”文化经验更应予以特别关注。探讨两浙人文传统孕育的历史经验，可以追溯很远，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是对其的恰切赞誉，但就推动浙江文化的发展并使之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深刻影响而言，却主要是在南宋以后确立“文化中心”地位以来。这样，单纯“浙江”意义上的“两浙文学”内涵就十分显豁。从这一视角切入，探究区域文学现象同区域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由此研究区域文化对文学现代进程的推动意义就非常显著：诸如探讨历史上三次文化中心南迁对造就南宋以来两浙文

^① 参见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学特别繁盛的意义，论证两浙地区日益浓厚的启蒙文化思潮对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意义以阐明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沿海地域作家的外向拓展意识所显示的汲取文学思潮多样性与建构文学创新传统，等等。这既是对地域文学传统研究的一种深化，同时也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规律的探寻，有助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层揭示。因此，就总结浙江的传统文学经验而言，可以取“江南文学”视野，但更值得关注的应是晚近的“两浙文学”观念。

探讨历史积淀的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以往论说文学的现代性，总是外来思潮影响论占据上风，对传统与文学现代性关系的研究虽已有所触及，但尚未深入，特别是缺乏从一个特定地域的实证论析中把握传统文化思潮对文学发展进程的推动。就此而言，两浙文学的研究价值恰恰得以呈现，因为它可以为此种关系的论述提供最具典型意义的实证。两浙文学资源丰富，不仅反映出传统文学的积淀深厚，同时也体现出新文学资源的极其丰富。南宋以来的两浙文学固然已引领中国文学的潮流，五四以来的浙江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具有显赫的地位，以鲁迅领衔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群阵容壮观、成就斐然，且往往引领了中国新文学潮流，因此历来有浙江作家写了“半部中国新文学史”之称。研究此种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现象，探究两种文学各自的成因及其前后传承、递进、发展的趋向，无论是就总结浙江文学自身的经验还是由此观照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而言，都有极重要的价值。

对于此种价值的论定，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仅就立足于浙江研究地域人文传统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并由此及于对整体文学的观照，至少具有以下两重意义。一是研究传统文化思潮对于深化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确立人的近现代理性，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及其思维方式的改变，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从而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

思想的近现代化发展开辟道路。而确立这一目标，正是启蒙文化思潮所关注的重点。因而，考量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研究启蒙思潮的演进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这一话题的缘由所在。中国启蒙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外来思潮的影响，也有“传统内”近代理性的日渐积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对此作出恰当的梳理与描述，并寻绎出与之对应的文学发展经验，对于深化中国文学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两浙文学”层面上，就可以找寻出这样的对应关系，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启蒙文化思潮的延续、对接过程，从中探讨文学领域里现代与传统的传承关系，揭示现当代文学充分吸取中国古代文学精神资源以推进文学的现代进程，就能为重构民族文学传统并走向现代与世界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二是总结浙江文化传统对于深化浙江文学研究的意义。就浙江文学发展历史而言，其在全国取得优势地位，主要是在南宋以后，到新文学时期，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原因就在于积淀深厚的两浙文化传统为其提供了历史基因。其中启蒙思潮对推进中国文学现代化，从近代至五四新文学时期，都是非常突出的。浙江涌现的一批启蒙文学大师，从近代的龚自珍至19—20世纪之交的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周氏（树人、作人）兄弟等，既弘扬两浙启蒙文化传统，又融合世界启蒙文化潮流，在创建中国新文学方面取得了无可取代的地位，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探讨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浙江传统”就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把握浙江传统的基本内涵及其复杂构成，揭示其对文学的近现代转型所产生的作用，就能够清晰地展示浙江文学自身发展的经验，这对于在文学领域内总结和弘扬“浙江精神”是颇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

研究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许多问题值得认真思索与探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探讨两浙人文传统的生成背景，梳理其发生、发展及深化、变异过程，研究它对于促进浙江地域文学及其对中国整体文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意义。还可论及人文

传统、启蒙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几种文体、文学类型在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与意义，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较为全面、系统地把握两浙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探讨它对浙江文学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等。有鉴于此，我们拟在上述命题上作出初步的探索。

1.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整合研究。这是对中国新文学史上一种重要文学现象的梳理与描述，是以两浙文学作为典型例证讨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茅盾领衔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群，阵容壮观、成就卓著。而且，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都是某种文学思潮、某个文学流派或某种文学体裁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正是他们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创造了辉煌业绩，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我国由“五四”开创的现代文学优秀传统中，浙江作家所提供的宝贵经验正是它最突出的部分之一；而他们在各个文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也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缩影。探讨中国新文学的“浙江潮”现象，其意义不只是在揭橥地域文学经验的层面上，以此为切入口，的确可以在地域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中挖掘出许多对于总结中国新文学发展规律极具观照意义的东西。文学群体的形成，是在一定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又因群体合力的形成对特定文学思潮起重大推动作用，乃至影响整体文学格局的建构。浙江作家群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融通世界文化新潮的现代观念，总是显示出其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大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思潮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系统论述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当有利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深化。这个视角论述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侧重于对群体的细部结构描述，即展示在中国新文学背景下形成的七个作家群：浙东乡土作家群、“湖畔”诗人群、“白马湖”作家群、“语丝”作家群、浙东左翼作家群、“现代”作家群和战时浙江作家群。对每个作家群的论述，大都叙述其生成背景、成员构成、思想与创作倾向、文学创作的独特成就及其为中国新

文学提供的独到历史贡献，由此或可形成对这一作家群体的整体认知与理解。

2. 两浙人文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其总体思路是把百年浙江文学放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研究，揭示其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浙江作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地位是如何形成的？经过深入探究可以发现，这不仅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开放语境等“外源性”因素有关，更与为研究界所长期忽略的“内源性”文化传统即两浙人文传统紧密相连。其一，“越人”的勇毅性格和丰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赋予了浙江作家勇于以文学承担民族解放重任的独特品格。其二，浙江文化的“务实”传统，使浙江作家率先承担起以文学参与民族改造和社会改造的时代重任。其三，浙地文化先贤从汉代王充以来的“人本”思想，直到明清之际王阳明的平民化思想、个性解放思想，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乃至近代龚自珍、章太炎的启蒙主义思想，为浙江作家从事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平民主义等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建构提供了先天的人文支持。其四，浙地处于南北交通要冲又面海而居所形成的善于容纳各种外来文化的开放、博纳风气，赋予了浙江作家善于容纳世界文学新潮的品格，导致他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拓之路上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有容乃大。其五，两浙文化“浙东尚实，浙西崇文”的传统，赋予了浙江作家极为丰富的文化个性和艺术个性，为丰富20世纪中国文学的风格作出了重大贡献。总之，两浙人文传统所形成的“内源性”力量，不仅成就了独特的“浙江潮”文学现象，同时它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就此而言，对这一视角的研究，不想只止步于浙江这一区域的文学现象的总结，同时，还更想为只专注于外来文化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某种启示。

3. 两浙启蒙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这是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发展为参照，将浙江启蒙思潮和启蒙文学置于特定的坐标内，考察其生成背景，展示其演变历程，探讨其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形成和发展

的重要推动意义。目的在于以更为开阔、宏观的视野审察地域文化与文学，同时也在于总结全局更具观照意义的经验，使地域文学研究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两浙启蒙思潮分成前近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逐层推进，论述启蒙思潮促进浙江文学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文学向近现代方向转型，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的重点是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发展为参照，研究两浙人文传统中富有生气的启蒙文化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着重探讨它对推动整个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意义。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是从近代文学视角切入，将近代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结合部”，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现代化进程，重点关注启蒙文化思潮对于深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学术意义。具体内容是在总述两浙地域历史文化背景基础上，依此阐述两浙前近代启蒙思潮与文学的近代导向、两浙近代启蒙思潮与文学的近代转型、两浙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力图对两浙启蒙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有历时性、全面性的把握。

4. 地域的文化记忆与想象——20 世纪江南散文研究。就地域文学的生成形态而言，散文表达作家情绪、感受的直接性，蕴藉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是所有文体中表露地域文化观念、文化质地最显著、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在解剖两浙文学的具体文学形态时，特选择散文加以研究。这里研究的“江南散文”，是“两浙文学”衍生的概念，其研究范围稍稍有所延伸与拓展，意在从一个局部的文体领域总结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更具观照意义的经验。研究思路是根据中外哲学、艺术、文化等领域有关“人与地”、“文与地”的理论资源，尤其是两浙地域内历史形成的人文传统及地域景观理论资源，对几种理论资源进行梳理与整合，并结合 20 世纪江南散文创作及对江南散文中景观的解读与传播的实际情况，研究 20 世纪江南散文的发展历程、文化精神、美学形态以及散文中景观的形象塑造与传播情况，由此总结出两浙文学对整体文学的推进意义。研

究的侧重点，是试图建构起立足于两浙人文传统与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解读、描述理论以及景观散文中景观形象读解与传播的理论，这对于认识江南地域形象无疑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论述的具体内容是：以 20 世纪散文作家的江南城市想象与记忆为逻辑起点，重点选择上海、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六个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 20 世纪散文中的江南城市形象建构以及建构背后的文化意识与审美观念，从而显示散文作家与江南城市之间复杂的“人—地—文”关系。

5. 对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中的经典作家鲁迅的思想与艺术的深层解读。鲁迅无疑是现代两浙文学中最卓越的代表，其引领中国新文学的典范性意义已为人们广泛研究与认知，现在还可以切入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缪斯女神”的另类表达式：鲁迅小说诗学结构研究。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在“铁屋子”中发出的启蒙声音曾引起强烈的震撼，此种声音的发出源自作家的心灵体验和内心矛盾。自有文字以来，作家想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也许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内心有“毒气”和“鬼气”，且生怕这不适宜的“毒气”和“鬼气”传染给读者时，再想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鲁迅曾长期陷于“不可言说”或“无法言说”的尴尬困境不能自拔。最后，鲁迅发现结构并不只是一个沉默的容器，默默无言地承载着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节、话语，它可以在不动声色中与话语并肩而立，承担着表达的重任。于是，“不可言说”的难题才得以破解。基于如此理解，这一视角的研究，将着重探讨鲁迅小说中多种类型的结构，如“铁屋子结构”、“序文结构”、“复否定结构”、“封套结构”、“反比例结构”，等等，其中重点提出并探讨“智情双结构”。每类结构不仅分别从鲁迅小说的启蒙理想、言说困境、读者意识等多维角度予以分析，并且相应结合《狂人日记》、《阿 Q 正传》、《伤逝》、《示众》等经典文本予以论证。

6. 两浙女性文学：由传统而现代。由启蒙而导致女性意识的觉醒，

是促成“女性文学”生成、发展与深化的重要前提。因此，在所有文学类型中，“女性文学”与启蒙思潮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紧密。探讨晚近以来两浙地区浓厚的启蒙文化思潮与文学形态形成的关系，选择“女性文学”，便是考虑到其与启蒙思潮的独特关联性。而就女性文学自身成就而言，启蒙思潮促成的两浙女性文学，曾显现出相当发达的景观，古代文学中从明末到清代，两浙出现多个女性诗人群，现当代文学中的两浙女性作家也不乏引领中国新文学潮流之先者，因此有足够的文学资源可供研究与发掘。中国女性文学历史悠久，到宋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到明清更是蔚为大观，女性作家层出不穷，作品大量涌现。其中两浙女性文学占三分之一，可谓成就卓著。近三百年来，两浙女性文学逐渐从传统向现代嬗变，其妇女观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观念向“男女平等”的现代观念蜕变。与此同时，两浙女性文学的主体意识逐渐确立，并不断加强。具体来看，清代两浙女性作家开始了艰难的蜕变，她们不愿桎梏在闺阁之内，而是努力寻求突破，挣扎于闺阁内外。清末民初，两浙女性作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胆量和勇气冲出闺阁，走向社会，从而完成另一次艰难的蜕变。两浙女性文学在嬗变的过程中呈现出群体化现象，其中包括同人化与家族化两种类型。两浙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嬗变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两浙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富裕的地方经济，从而产生了一种有利于形成女性作家群的宽松环境，使两浙女性能够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一切对于促成女性文学的繁盛都有极重要的作用。

上述各个研究角度，均是立足于两浙文学和两浙人文传统，探讨一个特定地域积淀深厚的文学经验，并以此揭示与之对应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关系，进而总结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使研究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不妨说，这样的研究不乏创新之处，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创新意义：一是从人文传统、启蒙思潮视角，对中国文学的两次重大转型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从中总结规律性的经验，就深

化中国文学研究而言是不乏理论创新的；二是研究从一个独特的地域切入，对于整体的中国文学具有强烈的观照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浙江的启蒙文化思潮启动较早，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这里入手，探讨它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意义，把握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效途径，可以说是找到了极佳的切入口。

王嘉良

目 录

总 序 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两浙人文传统与中国新文学的奠基	(7)
第一节 两浙人文传统与王国维的新文学奠基工作	(7)
一 两浙人文传统中的“科学”精神与王国维“纯文学”观的 提出	(9)
二 两浙人文传统中的人学、启蒙思想与王国维的现代文学 批评的确立	(12)
三 浙西文化的“博雅”之风与王国维的“世界文学”观的开创	(19)
第二节 浙东文化传统与周氏兄弟“为人生”文学的奠基	(25)
一 浙东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与周氏兄弟“为人生”文学的 译介	(26)
二 浙东文化中独特的“反抗”思潮与周氏兄弟偏师于“被压迫 民族”文学	(32)
三 浙东学术内涵深刻的“实事求是”之风与周氏兄弟的翻译文 体选择	(38)

第二章 两浙人文传统与五四新文学的开创	(44)
第一节 两浙启蒙文化传统与浙江文人群体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的重大贡献	(44)
一 两浙文化传统中“笃实”的民主、革新之风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青年》白话新文学同盟军的形成	(45)
二 两浙文化的启蒙传统与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建构	(49)
三 “江浙人文薮”与浙派文人在五四白话文学创作中的奠基	(55)
第二节 开放、务实、创新之风与两浙文人在新文学社团、流派中的领军作用	(61)
一 开放、务实、创新：两浙文化发展的动力模式	(63)
二 开放、务实、创新之风与浙派文人在现代文学社团中的主导地位	(67)
三 浙东、浙西：两浙作家所引领文学流派的不同风格	(73)
第三节 勇于开拓的性格与浙江文人对现代文学的文体贡献	(77)
一 浙江作家对于现代小说文体的创建	(78)
二 浙江作家在现代诗坛上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体创建	(83)
三 浙江作家在散文文体创建中的巨大贡献	(87)
四 浙江作家对于现代戏剧文体的贡献	(94)
第三章 两浙文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经典展示	(100)
第一节 经世、启蒙之风与浙东乡土小说的“土性”展示	(100)
一 浙东“土性”文化：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群形成的重要因素	(101)
二 浙东“土性”文化展示之一：“刚性”艺术气质	(106)
三 浙东“土性”文化展示之二：务实的批判启蒙之风	(109)
四 浙东“土性”文化展示之三：对刚健、洁净之土的眷恋和乡愁	(112)

五 浙东“土性”文化展示之四：内陆文明与面海文明的交杂 与冲突	(116)
第二节 两浙文化与“左翼”小说	(120)
一 越文化的“刚性”与革命的耦合：浙江“左翼”小说 群体的形成	(121)
二 浙东“左翼”小说风尚：革命视野中的乡土情怀	(125)
三 茅盾小说对于“左翼文学”品位的提升	(132)
第三节 两浙文化与“战时东南文艺”中的小说“浙军”	(142)
一 战时浙江作家群的本土回归与“东南文艺战线”的形成	(143)
二 “血与火”的时代洗礼：战时东南文艺中的“小说浙军”	(149)
三 浙东“土性”与战火中的“新启蒙”：战时乡土小说的 浙派风格	(155)
第四章 两浙文化与中国现代诗歌	(161)
第一节 西湖山水的人文积淀与“湖畔”情诗	(162)
一 湖畔情诗对于中国新诗体建设的意义	(163)
二 西湖的多情山水、人文积淀与湖畔情诗的精神关联	(168)
第二节 浙西文化与徐志摩诗歌创作	(176)
一 浙西“水性”文化在徐志摩诗歌中的呈现	(177)
二 浙西文化的“柔性”特质与徐志摩诗的婉约风格	(180)
三 浙西文化的“醇雅”之风与徐志摩诗的清新格调	(182)
第三节 浙西文化与戴望舒的诗歌创作	(186)
一 浙西文化的“重情”传统与戴望舒的诗歌创作	(187)
二 浙西文化的开放之风与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融合性	(190)
三 浙西文化的超逸之风与戴望舒诗歌的自由向往	(193)
第四节 浙东文化与艾青的诗歌创作	(197)
一 浙东文化中的“事功”传统与艾青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197)